

美方画的“芯片大饼”充不了自己的饥

国际锐评

围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舆论近日纷纷表示不看好。《纽约时报》称，法案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恐怕很多年都难以见效。《华盛顿邮报》刊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丹兹曼的文章，质疑“芯片法案”是“昂贵的笨蛋”还是有效的创新催化剂。

这项长达上千页的法案为何广受质疑？因为从内容到目的都不单纯。它是之前《美国竞争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多个法案的“公约数简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向半导体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二是为企业提供规模约240亿美元的25%投资税收抵免；三是拨款约2000亿美元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

通过这些，美国画出一张总额约2800亿美元的大饼，吸引企业在美国建厂，促使先进制程(低于28纳米)芯片制造业向美国集中，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

一些分析人士将这部法案称作“美国历史上重新支撑一个离岸行业作的最大努力”，这说出了美方大费周章“画大饼”的直接原因。行业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中占37%份额，到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2%。眼看制造业外流远超预期，美国迫切希望挽回局面。在白宫发布的相关说明中，“芯片法案”的目的就包括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加强供应链等。

外界还关注到，这部法案同时规定，获得美方补助的企业十年内不得与中国或其他“令美国担忧”的国家，进行任

何“重大交易”以及投资先进制程芯片。这些所谓“护栏”条款以及直接点名中国，凸显了美国难以遏制的战略焦虑。

近年来，中国等部分国家在半导体制造业领域持续取得进展，引发了美国的不安。法案胁迫芯片企业选边站队，目的是给中国等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设置障碍，增强美国在芯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这也是美方这部法案出台的更深层原因。

美国有发展自己的权利，但不能以阻止别人发展为代价。这种在冷战思维主导下的芯片产业保护政策，注定事与愿违。

首先，这部法案有“先天性硬伤”，因为它违背了产业发展规律。芯片产业高度全球化，遵循要素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回报的规律。美国一些人以为他们与芯片业

回流之间只隔了一道补贴，事实上差的东西太多了，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整体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与全球芯片市场动辄数百乃至上千亿美元的产值与利润相比，美国政府拿出520多亿美元补贴不具吸引力。而采用专项性产业补贴对抗市场规律，早被历史证明是徒劳的。

同时，该法案没有触及造成美国制造业外流的核心积弊。人们记得，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富士康公司曾打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液晶面板厂，但到2020年特朗普输掉大选，该项目工厂还没有建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缺乏现代先进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特别是美国两党内斗、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扯皮，

不是几百亿美元补贴就能够解决的。

此外，对非美国芯片企业来说，美方画的这张“大饼”更像是捕食者潜伏的大嘴。《芯片与科学法案》想整合盟友的芯片制造业到美国本土搞芯片供应链，以排除竞争对手。但实际上最先受到威胁的是三星等美国盟友的企业。想想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2013年至2014年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肢解”，那些非美国芯片企业如果真被美方许诺吸引过去了，恐怕前途堪忧。

至于对竞争对手的打压，这个法案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了相关的企业和技术，就几乎封死中国等其他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升级之路。这种假设暴露了美式霸权的无知与幼稚。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机构

估计，如果华盛顿采取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制造麻烦，但美国半导体企业受损更大，预计将使它们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并减少1.5万个至4万个高科技工作岗位。

而从中美关系史来看，美方的打压有哪一次达到了目的？以太空探索为例，从《考克斯报告》到沃尔夫条款，美方千方百计想把中国排除在“太空俱乐部”之外。但今天在地球上空运行的“天宫”，就是美国类似图谋适得其反的最好证明。

政治干预违反市场规律，技术封锁违背发展大势。时间将证明，美方给竞争对手使的绊子、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埋下的雷、给世界芯片产业发展挖下的坑，最终都会反作用于它自身。



廖省·林越

南洋继续传承陈嘉庚精神

——陈老逝世61周年纪念

力，所作所为，印证了陈老“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崇高信念。

根据《福建日报》《福建侨报》2014年的资料，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南洋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捐款达70亿元。各属华侨还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为日企工作的运动，给日本军国主义沉重打击，日寇对陈老恨之入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新加坡危急。陈老应英总督托巴斯之请毅然负起抗敌任务，但英军毫无斗志，一触即溃，举白旗投降。陈嘉庚痛心之余，只好与侨领、抗日志士撤离新加坡。

陈老在惠安籍侨领刘玉水陪同下，于1942年2月3日乘“小火轮”经马六甲海峡抵达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次日，日寇封锁马六甲海峡，船只一律禁行。强令18岁至50岁新加坡华人到5个地点接受“检证”，有6000多名华侨华人被日寇枪杀。

陈老一行人乘坐的“小火轮”抵达苏门答腊淡美那口岸时，检查站人员竟以护照未经荷兰驻新加坡领事馆签证为由拒绝陈老上岸。随行人员以战时特殊情况晓以大义，检查站方愿意放行。当地华侨闻讯，尽管日寇压境，还是举行了热烈的欢迎集会。

笔者综合各项资料及苏岛廖省老辈华人记述，“淡美那口岸”即为当时英得其利苏

丹王朝属地的“淡美拉汉”(Tembilahan)。陈老一行随即溯流到苏丹首府宁岳(Rengat)，在“中华学校”宿舍稍作修整，乘车经直洛关丹(Teluk Kuantan)绕道往西，于12日到占碑(Jambi)苏丹管辖的双溪那礼(应是 Sungai Dareh)，计划在福东橡胶厂内隐蔽。不料日伞兵15日在巨港降落，万余荷军不战溃逃，占碑地区已在日军枪口之下。

在乡侨吴顺通的协助下，陈老一行于21日由巴东(Padang)登上开往爪哇的班轮，25日抵达芝拉扎(Cilacap)港，在林宗庆安排下顺利通关。乘车经万隆到巴城(Bataavia)，由南侨总会副会长庄西言秘密带往展玉(Cianjurr)陈泽海的胶园内匿居住下。

庄西言安顿好陈嘉庚后，返回巴城。第二天，巴城就陷入日军之手，庄西言与许多抗日侨领被日军逮捕。日军宪兵多次审讯庄西言，逼迫他交出陈嘉庚的下落。庄西言坚称陈嘉庚不在巴城。日军施以酷刑，但庄西言咬牙坚忍。陈嘉庚闻讯后，觉得一旦被日军搜捕到，势将累及庄西言及其一家老小的性命，于是决定转移到泗水避难。

刘玉水到陈泽海胶园与陈老会合后，准备当晚乘火车往泗水，却买不到车票，只好改乘次日的慢车。幸好他们延误了一天，否则恐怕难逃厄运。因为日军前一天刚占领

了泗水，在各车站码头严加盘查来往旅客。如果不是延误，他们岂不是自投罗网？

刘玉水与几位集美校友决定把陈老藏到中爪哇梭罗市。梭罗侨商黄丹季在爪哇哇玛朗(Malang)有工厂，陈老化名战前来的“李文雪”，剃掉头发胡须，乔装打扮住下来。但刘玉水觉得玛朗不宜久留，又把陈老移到峇株(Batu)镇亲戚的小别墅，这里十分僻静安全，陈老称之为“晦时园”。1943年8月，他开始动手撰写《南侨回忆录》。

《南侨回忆录》于1946年初版，多次再版。是陈嘉庚先生于1943年至1945年在印尼避难时所写的回忆录，他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以真诚质朴的笔调，详尽地描述了自己40多年的人生经历，记录了南洋华侨为襄助中国抗战而做出的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日子，南洋侨界筹款，抵制日货，并动员华侨子弟参与抗日运动。让“南洋华人”的风骨、气节在海内外传扬至今。

时至今日，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西方欺凌、诬蔑时，当神州大地冒起分离主义时，当海内外华人出现“汉奸走狗”时；我们还能在媒体、网络上看到“南洋”各地华人的正义呼声！这肯定是受到陈老及当时侨领的感召。陈老离世61载，但精神永在！

回味无穷

雅加达·王伟豪

在汽车修理站见到穿连体裤的员工，勾起了当年在技术学校的回忆。土木工程系有土木技术的实习课程，一星期有两节课，历时四个小时的技术训练，整班的同学都穿上具有自傲灰色的连体裤。

同学们是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少也是从外地来的。在学校附近住宿，或在亲属家住，对清洗连体裤有一定的难处。有些同学的制服穿了两三次都没刷洗过，各自都有苦难言，找不出理由，使得整个车间充满了刺鼻令人窒息的臭豆腐味，腥味、潮湿腐朽的汗水味，难以忍受，引来了无数的苍蝇飞舞在他们身边，为车间增添恶心的臭气。

还记得，头次实习时，车间是一幅清洁、整齐，举目可望显眼灰色的场景，洗衣粉芳香四溢。如今连体裤都快不成样子了，破烂了也没去缝补，变了色又破烂的底裤暴露在外，真好看。显眼的灰色成了五颜六色的色彩，淡灰，深灰，灰白，都已逊色无光彩。一两位同学，满制服都是蘸着不同颜色的油漆印，残留在自豪的灰色连体裤形成野战军的军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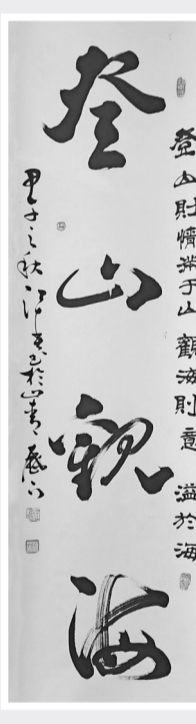
回想当时，车间里挥着锯子，铁锤，刨子，凿子，钻子等用具，好似专业的技术工一样。当大家一起实习时，尖齿的锯子发出锯木的吡啾吡啾声，刨子刮平木板嘶哑声，铁锤啾啾敲打凿子声，钻子钻孔的超微声，好似灰色连体裤交响乐队，现场合作演奏出动人的旋律，响亮悦耳的车间音乐。大家高兴高采烈地完成老师分配的作业，望求拿到最好的成绩。

怀念在车间里的场景，锯木时汗水掉在木板形成的画纹，凿子削木穿洞，那碎木屑四溅喷飞和飘来的木材香味，难以想像内心的满足感！看着完美的作品，自己精心的杰作，无法伦比的自得其乐满意潇洒。

求学年代里，身穿襤褸，意志坚定，求知欲强，不达目的不休止，向上提升的精神！

话说完了，人生如有轮回，总想再回到当初，不是为了什么，只想再闻那种臭豆腐味，腥味，潮湿腐朽的汗水味……哦！我的褪色连体裤，再见了！

江春 书法作品



肉丸面和瓶装茶

中国科技在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反之亦然。不过，我们很难详细说明这种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探究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想要找到真实的信息来源，从纷繁复杂的传说中甄选求真相，可能需要侦探般的思维和敏捷度。再说，即便某些来自中国的技术可以传播到印尼，但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华人居住的地区，成为华人安身立命的技能。即便如此，也有一

些创新为当地居民所吸收和接纳，如今成为印尼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列举几个华人在印尼基础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简单探讨一下其影响、融入当地文化实践的时间及局限于传播群体的程度。如果没有能够融入当地的习俗，那么原因何在。如今，在知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印尼华族将全球性科技引入印尼也同样功不可没。

烹饪术语

这一部分探讨印尼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食物和物品，简单的追溯方法就是在印尼语当中找出华语借词，特别是源自福建话或闽南语的词汇。倘若印尼语中有许多常用的词汇被公认为华语词汇，那么这些词汇极有可能都来源于中国，并在努山达拉群岛(Nusantara)上经过借用和适应的过程，从而形成如今的面貌。

孔远志(Kong, 2009)将印尼语中发现的454个华语借词分成十一类。其中，食物或食品类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

基础科学与科技

玛丽·索默斯·海杜丝(MARY SOMERS HEIDHUES)

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常见。此外，诸如中国宗教和风俗习惯的词汇(如Toapekong大伯公，capgomeh十五夜即元宵节)、对朋友和亲属的称谓或者各种游戏名称(尤其是赌博)(Kong, 2009: 308-309)都广泛应用于华人社交圈，其意义也为当地社会所认可(详见本书第二部分《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

上述大部分华语借词都与黄豆及其加工工具有关，可以称之为“食品技术”。ta-hu(豆腐)，是由黄豆发酵而成的。或许，这是最古老的、迄今仍为人们所知的外来借词。人们在10世纪初的爪哇古碑文中发现了tabu(豆腐)一词，但直至19世纪初，这个词才流行起来。后来，出现了一些派生词，如tauge(豆芽)(多指绿豆或黄豆制作出来的)和kecap(酱油)(Jones, 2009)，均由黄豆加工而成。当地人还将这种技术发扬光

大，以整粒黄豆为原料制作出了豆腐饼[1](tempe)，显然为世界食品多样化作出了真正的贡献。

另一类是带有面条之意的词汇如mie(面条)、bakmi(面条)、bihun(米粉线)和kuetiau(粿条)等等，都是印尼语中食品类词汇。这类食品是以米粉或面粉为原料，被揉成面团后加工成不同形状。这也是一种食品加工技术。如果将面团加工成不同形状，放在锅里蒸或烤，就可以制成kue(糕点)。Kue是华人用来称呼糕点的词汇。此外，从速食面的风靡程度，我们还感受到印尼人民对Mi(面条)的无限热爱之情。这些都是由中国传入努山达拉群岛。

华语借词ciu(酒)通常是用来自称呼米酒(Arak, rice wine)，而另一含有“酒(Tuak, Wine)”之意的非华语词汇anggur则指的是葡萄酒。当ciu(酒)变酸(且不含酒精)

后，就变成了cuka(醋)。Cuka(醋)是另一来源于中国的词汇。17世纪，巴达维亚(Batavia)城郊是华人糖厂和农民聚居之地，在这里出现了几家华人经营的酿酒厂。自元朝(公元13-14世纪)起，中国就发明了蒸馏提取技术。这些工厂以米、糖和椰子为原料，发酵酿成酒。这些酒除了自用之外，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定期将上述大多数酒出口到荷兰。

酒是一个例外。华人将酿酒技术引进印尼，但当地人并没有选择去学习这门技艺，因为穆斯林禁饮酒精类饮品。至少，当地人酿酒并不普遍。另一方面，茶是华人引进印尼的另一种饮品，同样经过发酵制作而成，并且不含酒精。正如罗德里奇·巴塔克(Roderich Ptak)所言，茶在印尼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些地区的人民马上种起了茶树。到了20世纪，特别是受到瓶装苏打水的启发，印尼人民还充满创意地生产出一款用华语命名的特色饮品teh botol(瓶装茶)。

这些源源不断被制作出来的大多数食品，都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地食品中，各类豆制品是当地人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烹饪印尼美食不可或缺的材料。更为甚者，当地的烹饪方法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也包括如今摆放在印尼老百姓厨房里的各类烹饪工具。如，铁锅来自中国，而印尼马来语中的pisau(刀)一词也似乎来源于远古时期的华语词汇“匕首(bishou)”，两者所指为同一物。虽然印尼有些地区生产炼铁所需的矿石，但爪哇岛上并没有铁矿。况且，有铁矿的地方，就意味着需要一定的人力去开采和加工。中国有许多能工巧匠，冶炼和锻造铁器的技术出神入化。因此，中国制造的主要用于出口的铁器极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口到爪哇，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的10世纪左右。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